

# 清代徽州幕友群体探析

——以徽州地方志资料为考察中心\*

朱慧敏

**提要：**科场竞争造成一大批徽州读书人入仕无门或升迁艰难。为了谋生、重新获得入仕机会，一部分读书人选择在地方官府作幕友。虽然幕友不是朝廷正式的官员，但他们可以经常出入官府，为地方官出谋划策，协助地方官处理各类行政事务，这使得他们的职业逐渐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准官僚特征。作为清代幕友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徽州幕友的作幕行为反映了整个清代幕友群体共同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通过考察清代徽州幕友作幕的原因、家庭出身与功名，对于我们加深对徽州读书人这一群体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我们揭示了清代徽州科举文化与幕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清代 徽州 幕友 家庭 功名

幕友，又称幕宾、幕僚和师爷，是中国古代官府里没有正式官职的佐治人员，一般由地方官聘请。清代“总督抚以下司道府州县，衙门虽自不同，俱各延幕宾”<sup>①</sup>，读书人从事幕业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幕友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百年来，学界对清代幕友已有比较全面的研究<sup>②</sup>，有关“绍兴师爷”的研究成果亦为数不少<sup>③</sup>，但目前尚未有专文探讨徽州幕友问题。清代徽州人才辈出，其中不乏从事幕业的徽州人。作为清代幕友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徽州幕友的作幕行为反映了整个清代幕友群体共同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通过考察徽州幕友的家庭与功名状况，既能窥探清代徽州幕友作幕的社会背景，又能揭示清代科举制度运行与幕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

## 一 徽州幕友作幕的原因

清人黄濬说：“古人凡当一面者，无不妙选幕僚，其作用有二：一则如今所谓专家治事，一则罗致有声名气节能力之才人，资其见识以救匡疏失，丰其俸养，勿使去而为患。”<sup>④</sup>客观上讲，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代商业变迁与徽州商人转型研究”（项目编号：19JJD770001）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田文镜撰：《州县事宜》，“慎延幕宾”条，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黄山书社，1997年，第3册，第676页。

② 参见刘则刚、李金昭：《二十世纪的中国幕府研究》，《东南学术》2001年第4期；尚小明：《清代士人游幕表》，中华书局，2005年；吴佩林、范鹏鹏：《百年来清代州县幕友研究述评》，《地方文化研究》2016年第6期。

③ 参见郭润涛：《试论“绍兴师爷”的区域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王振忠：《绍兴师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郭建：《绍兴师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郭润涛：《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鲍永军：《绍兴师爷汪辉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朱志勇：《绍兴师爷与中国幕府文化》，人民出版社，2007年；钟小安：《求仕·游幕·佐治：绍兴师爷手稿整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陈宝良：《明清幕府人事制度新探——以“幕宾”“幕友”“师爷”为例》，《史学集刊》2020年第4期。

④ 黄濬著，李吉奎整理：《花随人圣庵摭忆》，“曾国藩幕府人才之盛”条，中华书局，2013年，第341页。

清代中期幕府的兴盛与日益繁剧的地方政务密切相关。<sup>①</sup>当然，清代读书人作幕的原因，主要是作幕能满足读书人多方面的需求。接下来将具体分析徽州读书人作幕的原因。

第一，为了实现入仕的理想。对于没有考取进士的徽州读书人来说，“通过入幕而实现入仕是一条相对容易的途径，因为幕佐入幕充职不通过朝廷任命，而是由幕主聘请入幕，入幕后任何职，基本决定于幕主”<sup>②</sup>。例如，婺源人汪对扬曾在江西奉新县吴宪文幕府任职，在作幕期间，其多次参加科举考试，最终只考中了诸生。<sup>③</sup>又如，婺源人戴鼎铭“为文渊博宏深，不落时蹊”<sup>④</sup>，考中秀才之后，在江苏一带作幕多年。其间，戴鼎铭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均以失败告终。还有个别徽州幕友在科考屡次失败之后，通过捐纳的方式获得官职。例如，黟县人叶梦衢“应童试辄列前茅，文名藉甚”<sup>⑤</sup>，乡试失败之后，先后辗转江西南昌、新建、鄱阳、安仁等地作幕，后来通过捐纳的方式获得光禄寺署正一职。另外，一些徽州幕友通过“正途”<sup>⑥</sup>的方式得到了入仕机会。例如，休宁人汪由敦曾在浙江巡抚徐元梦幕府中任职。后来，徐元梦转任工部尚书，其入京赴任之时，汪由敦仍侍奉其左右。此时的汪由敦又以国子监生的身份参加雍正二年（1724）举行的科举考试，并顺利考取进士。此后，他官运亨通，官至吏部尚书。<sup>⑦</sup>“人生束发受书，求一第往往不可得。”<sup>⑧</sup>因此，一部分徽州举子在落第之后，仍然不遗余力地寻求入仕机会。他们往往将作幕视为继续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入仕机会的契机。在作幕期间可以读书作文，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他们自身的应试能力，进而增加中举的机率。尽管很多徽州幕友在作幕期间依然无法获得功名，但是幕业虽“无仕之名”，却“有仕之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他们未能通过“正途”入仕的心理缺憾。

第二，通过作幕赚取束脩，维持家庭生计，支持宗族建设。清代名幕龚尊说：“半世佣资，耗费于仰事俯蓄、雪炭绉袍之际。”<sup>⑨</sup>幕友的生活支出主要包括养家糊口、救济亲属和建设宗族。其中养家糊口是徽州人作幕最直接的原因。例如，绩溪人胡家升“家贫，舌耕为养”，妻子汪氏“资妆悉典卖以供薪米”。尽管如此，夫妻二人所筹集的钱财仍然不足以赡养双目失明的母亲以及三个尚未成年的弟弟。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胡家升转而寻求入幕的机会。进入幕府任职之后，胡家升通过多年的辛勤工作，不但摆脱了贫困的生活，而且使得“家计浃饶，兄弟友爱”<sup>⑩</sup>。胡家升以作幕的方式解决了家庭的生计问题，还有一些徽州幕友竭力救济生活困难的亲属。例如，婺源人胡凤翔自幼丧父，家庭极度贫困，“入庠后，游幕江浙……堂兄早故，力营丧葬。奉节嫂如母，抚侄如子。从兄某孑然一身，生养死殡皆翔肩任。堂叔某贫不能婚，典

① 参见郭润涛：《试论清代州县衙门设置幕府的原因》，《学术研究》1990年第4期。

② 黄云鹤：《唐宋下层士人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③ 参见吴鹤修，汪正元纂：光绪《婺源县志》卷26《人物·文苑》，光绪九年（1883）刻本，藏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

④ 葛韵芬等纂修：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32《人物·孝友》，“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上海书店，1993年，第27册，第591页。

⑤ 吴克俊、许复修，程寿保、舒斯笏纂：民国《黟县四志》卷7《人物·文苑》，“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8册，第103页。

⑥ 参见郭松义、李新达、杨珍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清代》，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42页。

⑦ 参见尚小明：《清代士人游幕表》，中华书局，2005年，第80页。

⑧ 陈仪：《陈学士文集》卷15《题送别江冠群诗后》，中华书局，1985年，第296页。

⑨ 龚未斋著：《雪鸿轩尺牍》，上海书店，1986年，第167页。

⑩ 陈锡修，赵继序纂：乾隆《绩溪县志》卷8《人物·孝友》，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158册，第400页。

屋助之”<sup>①</sup>。另外，徽州幕友为宗族建设作贡献的事例也层出不穷。例如，婺源人朱纯则通过作幕“积资归里，葺祠宇，修谱牒，助葬族之贫乏者十余柩”<sup>②</sup>。又如，婺源人俞嘉言：“游幕金陵凡三十载，岁获余资，辄周乡人之羸困者。晚年家居，宗族妇孺均沾其惠。同治间，重建至圣庙，与有劳焉。”<sup>③</sup>徽州幕友的束脩既维持了家庭的日常生活，又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宗族的各项建设。

第三，从事教育、著述立说、诗酒之会等文化活动。文化是区分读书人与社会其他阶层的标准，从事文化活动是读书人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方式。读书人作为文化的传播者，从事教育、著述立说、诗酒之会等文化活动是他们传播文化的重要方式。清代幕友占读书人总数的很大一部分，人数上的优势使他们成为清代文化重要的传播者与发展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清代幕友在文化上的贡献并不亚于通过“正途”入仕的读书人。徽州幕友是清代幕友群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作幕期间参与的文化活动也值得关注。例如，婺源的石光敏在作幕期间从事讲学活动，“年十六游庠，名声大噪，名公卿交口誉之，延为西宾，嗣就聘四川黄观察幕。久之，主东川书院讲席”<sup>④</sup>。黟县人汪文台，“见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谓有益于后学，然成于众手，时有驳文，别为表识，作《校勘记识语》，寄示阮元，元服其精博，礼聘之。又尝纂辑《七家后汉书》、《淮南子校勘记》及脞稿，皆行于世”<sup>⑤</sup>。汪文台在学术上的造诣备受时人推崇，而歙县人方正澍擅写诗文，“学诗于何士客，闭门索句，与袁枚激扬风雅，争长诗坛”<sup>⑥</sup>。因欣赏方正澍的才华，时任河南巡抚毕沅将其引入幕府。在此期间，方正澍曾参与《河南新乐府》一书的编撰。<sup>⑦</sup>其后，毕沅升任湖广总督，方正澍又协助毕沅纂修《史籍考》一书。方正澍在毕沅幕府任职期间，协助毕沅校定藏书共计数十种。<sup>⑧</sup>除了从事教育、著述立说之外，徽州幕友也经常通过诗酒之会进行学术交流。例如，歙县人吴钧精通诗文，在扬州与马曰琯、马曰璐相唱和，卢见曾“数招之为诗牌之会”<sup>⑨</sup>。休宁人方塘，“性豪宕不羁，书法瘦健，得晋人笔意，弱冠即受知方知府恪敏，聘为幕宾，后居西子湖几二十年，与浙中名士联诗会”<sup>⑩</sup>。另外，曾燠幕府中的幕友是以诗人为主，他在“署中辟‘题襟馆’，与一时贤士大夫相唱和”<sup>⑪</sup>。婺源王友亮也曾在扬州与曾燠进行文酒之会。徽州幕友在作幕期间所从事的文化活动，既有利于拓宽他们的学术视野，又有助于清代学术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从而实现他们经世致用的理想。

① 葛韵芬等纂修：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48《人物·质行》，“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第27册，第204页。

② 葛韵芬等纂修：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41《人物·义行》，“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第27册，第2页。

③ 葛韵芬等纂修：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46《人物·质行》，“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第27册，第126页。

④ 葛韵芬等纂修：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34《人物·文苑》，“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第27册，第621页。

⑤ 《清史稿》卷486《列传·汪文台》，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13423页。

⑥ 王锺翰点校：《清史列传》卷72《方正澍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5916页。

⑦ 参见史善长：《弇山毕公年谱》，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藏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

⑧ 参见石国柱、楼文钊修，许承光纂：民国《歙县志》卷10《人物·诗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246号，第1631页。

⑨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0，中华书局，1980年，第233页。

⑩ 何应松修；方崇鼎纂：道光《休宁县志》卷14《人物·风雅》，“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2册，第348页。

⑪ 钱泳：《履园丛话》卷8，中华书局，1979年，第215页。

第四，战争为徽州幕友提供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在清朝的多次战争中，徽州读书人也常常以幕友的身份参与其中。顺治五年（1648），佟图赖进入湖南征讨反清势力，婺源人汪斯醇因才能出众被辟入幕府，“帷幄多建策，湖南平，叙军功，授宝庆知府”<sup>①</sup>。康熙即位之初，三藩已成割据势力。康熙十三年（1674），爆发了以吴三桂为首的大规模武装叛乱，休宁人戴朝干进入张朝珍幕府，负责管理战船，参与军事谋划。因战功卓著，戴朝干受到云贵总督蔡毓荣的赏识。<sup>②</sup>至雍正年间，平定苗疆仍是清廷重要的兵事活动。雍正初，休宁黄宗夏进入广西提督韩良辅幕府，凡“耕于野，居于室，行于道途，处于卒伍者，咸仰韩公为保障，而宗夏实襄赞之。厥后，韩公奉命提军会滇督，平苗彝，宗夏崎岖军旅，规模布置，著有劳绩，韩公倚之，不啻为左右手”<sup>③</sup>。此外，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以巩固国家的统一，也是乾隆皇帝一生中重要的军事活动。歙县人洪范以诸生的身份进入福康安幕府，先后参与“平后藏，剿荡苗疆，歼除白莲教”<sup>④</sup>等，官至“兗沂曹道”<sup>⑤</sup>。晚清数十年间，战争频发，徽州读书人入幕从军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咸丰年间，太平军攻入徽州，曾国藩率军驻扎于祁门县，黟县人孙式荣主动向曾国藩谏言，提出“无忘九江之败”<sup>⑥</sup>，曾国藩对此大加赞赏，将孙式荣引进幕府。同时期，负责镇守皖南地区的张芾将婺源人朱家骏引进幕府，派遣其在婺源兴办团练。<sup>⑦</sup>除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徽州幕友也积极抵御外来侵略。歙县人鲍增祥“幼颖异，好为经世之学，尤精于舆地”，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鲍增祥进入龚照瑗幕府，为其出谋划策。<sup>⑧</sup>清代求仕人数众多，每年招录的人数有限，造成了一些徽州读书人入仕无门或升迁艰难。由于战事频繁，清廷实施奖励军功的政策，于是那些出身低微者才走向入幕从军的道路。

## 二 徽州幕友的家庭出身

清代徽州幕友入幕需要一定的社会关系，这是他们能够顺利入幕的客观条件之一。一般而言，他们的家庭出身往往决定着入幕所需的社会关系。概而言之，清代徽州幕友主要出身于官员家庭、商人家庭、幕友家庭。通过分析徽州幕友的家庭出身，能够窥探清代徽州幕友在教育经历、入幕心态、作幕活动等方面的共同性与差异性。

（一）官员家庭。清代的科场竞争异常激烈，读书人若要金榜题名，不仅需要良好的家境，还需要自身的禀赋与后天的努力。出身官员家庭的徽州幕友，家庭教育往往较好，即使不能通过科举入仕，也能通过从事幕业发挥自己的才能。徽州幕友的父辈不乏高官显宦，歙县人程恩泽的

① 葛韵芬等纂修：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24《人物·宦绩》，“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第27册，第442页。

② 参见何应松修，方崇鼎纂：道光《休宁县志》卷13《人物·武略》，“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52册，第319页。

③ 李果：《在亭丛稿》卷10《书幕府躬耕记后》，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31页。

④ 石国柱、楼文钊修，许承光纂：民国《歙县志》卷6《人物·宦绩》，“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246号，第960页。

⑤ 盛叔清：《清代画史增编》卷1，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第28页。

⑥ 吴克俊、许复修，程寿保、舒斯笏纂：民国《黟县四志》卷7《人物·文苑》，“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58册，第103页。

⑦ 参见葛韵芬等纂修：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35《人物·文苑》，“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第27册，第635页。

⑧ 石国柱、楼文钊修，许承光纂：民国《歙县志》卷10《人物·士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598—1599页。

经历就很典型。程昌期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官至内阁侍讲学士,入上书房。程昌期学识渊博,“为文融贯经史,诗取法韦孟,尤精考据”<sup>①</sup>。受到程昌期的影响,其子程恩泽自幼勤奋好学,饱读诗书。在父亲的引荐之下,程恩泽师从于考据学家凌廷堪。程恩泽于嘉庆十六年(1811)考取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道光元年(1821),选入南书房。道光皇帝曾对他说:“汝父兰翘先生昔年在上书房,朕敬其品学。汝之声名,亦所深悉,宜更守素行。”<sup>②</sup>在父亲的影响下,程恩泽仕途顺畅,身居要职。道光十一年,程恩泽进入陶澍幕府。<sup>③</sup>在作幕期间,程恩泽先后担任内阁学士、工部侍郎、户部侍郎。这也体现了徽州幕友“亦官亦幕”的双重身份。

一些徽州幕友出身于中层官员家庭。婺源人齐翀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官至广东南澳厅同知,协助厅长官管理海防事宜。<sup>④</sup>其子齐彦槐“幼秉夙慧,七岁即能文,年十四补博士弟子员”<sup>⑤</sup>,师从学术大家姚鼐。嘉庆十三年(1808)考中举人,次年考取进士,选庶吉士,担任江苏金匱县知县。<sup>⑥</sup>不久,齐彦槐因病辞官。道光四年(1824)至道光五年,先后进入两江总督魏元煜幕府和江苏巡抚陶澍幕府。道光六年,擢升苏州郡丞。道光九年,转而进入江南河道总督张井幕中,官至苏州同知。<sup>⑦</sup>齐翀的海防观念对齐彦槐的影响很大,齐彦槐在幕期间专门管理海防事宜,他提出的“驳海运之说”<sup>⑧</sup>对清代道光年间海防事业的发展具有一定作用。一些徽州官员在任期间廉洁奉公、体恤民情、勇于任事,他们的为官表现对子弟的人格形成、仕途之路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黟县人程式金,嘉庆二十五年考中进士。“道光初,历署四川盐亭遂宁知县,补高县知县。培植人才,清厘积案,整顿地方,民情爱戴。总督蒋攸钰荐治行第一,调华阳,署宜宾、成都,所在有实政……总督陈若霖、戴三锡先后以廉洁勤能荐,六年,升叙永厅同知。”<sup>⑨</sup>其子程鸿诏师从黟县名儒汪文台、俞正燮,“为文务宏丽,虽精博不逮其师,而文采过之。弱冠有声乡里……两中顺天副榜,选鸡泽训导,复中道光二十九年举人。”<sup>⑩</sup>咸丰五年(1855),太平军攻陷黟县,程鸿诏倡议团练,屡有成效。因其勇于任事、骁勇善战,咸丰十一年,被曾国藩聘入幕府。同治年间,先后进入湖广总督李鸿章幕府、安徽布政使吴坤修幕府。徽州幕友在仕途和幕业上的成就,除个人因素外,与其官员家庭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

另外,还有一些出身于低级官员家庭的徽州读书人,他们在父辈所任职的县衙充当幕友。婺源人余龙光“祖元遴为汪绂弟子,以理学称龙光。早岁读王阳明书后,乃渊源家学,潜心程朱之书,以居敬、穷理、力行为宗旨”<sup>⑪</sup>,于道光十五年(1835)考中举人,任江苏娄县知县。在

① 沈葆楨、吴坤修等修,何绍基、杨沂孙纂: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225《人物·文苑》,《续修四库全书》,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654册,第14页。

② 《清史稿》卷376《列传·程恩泽》,第11576页。

③ 参见吴常焘编:《梅郎中年谱》,本社影印室辑:《晚清名儒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13册,第450页。

④ 参见全士潮等辑:《驳案新编》卷27《广东司》,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361册,第281—283页。

⑤ 方浚颐:《续碑传集》卷77《金匱县知县齐梅麓先生墓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9册,第3147页。

⑥ 参见《清史稿》卷486《列传·齐彦槐》,第13418页。

⑦ 参见方浚颐:《梅麓诗钞》卷首《齐梅麓先生墓表》,清光绪二年(1876)重刻本,藏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

⑧ 魏源编:《皇朝经世文编》卷48《户政》,岳麓书社,2004年,第602页。

⑨ 沈葆楨、吴坤修等修,何绍基、杨沂孙纂: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187《人物·宦绩》,《续修四库全书》,第653册,第433页。

⑩ 朱师彻:《碑传集补》卷50《黟三先生传》,台湾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2723页。

⑪ 沈葆楨、吴坤修等修,何绍基、杨沂孙纂: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219《人物·儒林》,《续修四库全书》,第653册,第757页。

任期间，余龙光为江苏昆山水灾出资捐赈，政绩突出。余龙光勤政爱民、廉洁自律，对其子孙的思想观念和职业选择具有很大影响。其子余述古虽“辍举业，任家政。暇则为文词，自抒性灵……周族人贫乏。尝为娄县幕宾，所得薪水必归之父兄。后因江苏大灾，捐金倡赈，叙道库大使”<sup>①</sup>。余述古在其父亲的支持下，在江苏娄县充当幕友，参与县衙的行政事务，在地方公共事业方面成绩显著。值得一提的是，余龙光的长孙余家鼎“诗词琴画各擅尤长，书法尤精。工秋闱不售，遂幕游齐鲁吴越间，极为当道器重。委办海运有功，由县丞奖浙江知县，复委榷温州茶局，加同知衔”<sup>②</sup>。可见，幕业是出身低级官员家庭的徽州读书人的一种谋生方式，在徽州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父辈担任低级官职的徽州幕友，虽然他们的经济条件、教育资源不及出身中高层官员家庭的幕友，但父辈“以身立范，言行并举”的行为为他们从事幕业提供了一定条件。

(二) 商人家庭。徽州地处皖南山区，“从贾”和“业儒”是徽人的两条谋生之路，徽州逐渐形成“贾而好儒”<sup>③</sup>的社会现象。在徽商后代中以“业儒”成名者代不乏人，其中有不少名儒充当过幕友。例如汪由敦的家族是休宁溪口村的望族，到他父亲汪青城这一辈，家道中落。由于“舅祖有遗业在毘陵，府君为之经理，同邑金主事默斋引盐业，引府君自助”<sup>④</sup>，此后汪青城在江浙一带从事经商活动。汪父经商之余，仍坚持读书作文，对子弟教育也十分重视。汪由敦“幼颖异，读书目数行具下”<sup>⑤</sup>，五岁时便进入学堂接受教育。由于“徽人商杭者令甲别立商籍，由敦年十九游浙中，循例入试，补钱塘县学附生。故又为钱塘籍时，徐元梦抚浙江，闻其名，延致幕中。继元梦入为工部尚书，由敦以国子监生偕入都”<sup>⑥</sup>。在幕期间，汪由敦“雍正元年，以诸生充明史馆纂修。雍正甲辰进士，授编修。历官吏、兵、刑、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直南书房”<sup>⑦</sup>。汪由敦进入徐元梦幕府，与其在钱塘县的求学经历有关，这一经历离不开汪父的督导与支持。出身商人家庭的徽州幕友，他们的父亲“虽为贾者，咸近士风”<sup>⑧</sup>。乾隆时期的考据学家戴震，出身于休宁县的一个小商人家庭，自幼“读书好深湛之思，少时塾师授以说文，三年尽得其节目。年十六七研精注疏，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与郡人郑牧、汪肇龙、方矩、程瑶田、金榜从婺源江永游”<sup>⑨</sup>。因才识渊博，广交名士，戴震先后进入秦蕙田、王安国、卢见曾、方观承等幕府。显然，“贾而好儒”的商人家庭，在一定程度上为徽州幕友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

另外，咸同兵燹时期，徽州地区遭受重创。在这一乱局之下，徽州人“寒饿困殆，求一饱而不可得，不复能奔窜，亦不知贼之可畏”<sup>⑩</sup>，一些出身于商人家庭的读书人选择进入幕府任职，既能逃避战乱，又能重操儒业。例如歙县人汪宗沂出生在一个“贾而好儒”的盐商家庭。自康乾时期，歙县西溪汪氏家族就在江淮、京师一带经营盐业，堪称巨富。至先世汪景晷时，虽热心于儒业，却屡试不售，于是“弃儒术，操百缗以往，贾于浙之兰溪”<sup>⑪</sup>，为汪氏家族积累了巨额

① 葛韵芬等纂修：民国《重修婺源志》卷41《人物·义行》，“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第27册，第25页。

② 葛韵芬等纂修：民国《重修婺源志》卷35《人物·文苑》，“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第27册，第631页。

③ 参见张海鹏、唐力行：《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

④ 汪由敦：《松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89页。

⑤ 汪由敦：《松泉集》，第889页。

⑥ 钱仪吉纂，靳斯标点：《碑传集》卷27《加赠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谥文端汪由敦传》，中华书局，1993年，第896页。

⑦ 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嘉庆《大清一统志》卷113《徽州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5页。

⑧ 戴震撰：《戴震集》卷12《戴节妇家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7页。

⑨ 《清史稿》卷481《列传·戴震》，第13198页。

⑩ 黄崇惺：《凤山笔记》，《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1期，中华书局，第137页。

⑪ 刘大魁：《刘大魁集》卷8《汪府君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49页。

财富。其子汪泰安出资兴建“不疏园”，一时聚齐了江永、戴震、程瑶田、金榜、汪梧凤等文化名流，即使汪氏家族“贾而好儒”的风气愈加浓厚，又为徽派学术作了不少贡献。汪宗沂是“不疏园”的最后一位园主，他在“不疏园”的学习经历，为其充当幕友提供了必要条件。刘师培所撰的《汪仲伊先生传》记述了汪宗沂从“不疏园”到曾国藩幕府的过程，具体内容如下：

汪故巨族，世席丰厚，族众数百人，建不疏园以藏书，即婺源江氏、休宁戴氏读书所也。先生居园数年，手披口诵，以夜继昼，嗣从同邑程先生焜游学。甫成而粤乱起，转徙浙江、江西，饥寒困顿，诵读不辍。益好经世之学，讨治兵农礼乐诸大端，作《礼乐一贯录》。东南乱定，以所作谒湘乡曾文正公。时文正公督两江，延任忠义局编纂，因师临川李大理联琇，受汉学于先大父，受宋学于桐城方先生宗诚。于九流百家之学，莫不旁推交通，以宣究得失。<sup>①</sup>

上述材料表明，咸同兵燹时期，汪氏家族的商业遭受重创，“不疏园”的盛年光景已不复存在，但汪宗沂仍能做到“饥寒困顿，诵读不辍”，与浓厚的家风熏染有关。当时曾国藩幕府广招人才，汪宗沂作《礼乐一贯录》，备受曾国藩赏识，自此他开始辗转于各大幕府当中。

战乱时期，出身于“贾而好儒”家庭的徽州幕友，能够审时度势，因“业儒”入幕，又在幕府中潜心经世之学。绩溪人胡澍也有类似的经历，其父“家贫，无以供甘旨，乃弃儒而贾，往来江浙间数十年，遂致饶裕”<sup>②</sup>。由于太平军攻克绩溪，胡澍家族的旧居被毁，胡澍便携带家眷迁入浙江，重操儒业，在杭州知府缪梓幕府中任职。

当然，咸同兵燹时期，一些徽商子弟通过作幕友的方式与朝廷官员保持密切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保全了家族产业。歙县盐商程希辕、程桓生父子的作幕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sup>③</sup> 根据王振忠的研究，程希辕、程桓生均为曾国藩的幕友。程希辕充分利用与曾国藩的这层关系，为家族经营两淮盐业提供了便利条件。其子程桓生在这种背景下，与曾国藩的来往也十分频繁。《曾国藩全集》中收录了不少曾国藩与程桓生讨论盐务的书信，如同治二年（1863）十二月十七日，曾国藩《加程桓生片》：“盐务新章，赞者颇多。然国藩于鹾政究系外行，如有差误，祈详告我。再问尚斋仁弟台安。”<sup>④</sup> 盐商世家出身的程桓生在作幕期间，曾两次出任两淮盐运使，总办西岸、鄂岸督销局若干年。<sup>⑤</sup> 据程庆徐的《先府君行述》记载：

道光以前两淮盐法更咸丰乱，半多不可用，行盐诸省，江西毗闽、粤，多闽、粤盐，川盐之借销者，且及鄂省之半，而通、泰诸盐场不被兵，不患不产，患不销。主者持就亭发贩之策，顾反散走供私贩且资贼。上流则苦道梗，或淡食。比淮、扬下私贩稍稍戢，而镇江以上犹交兵，商人惮险不敢运，于是场商苦壅滞首尾并，亭户苦无所偿交困，课益绌。文正公既创制四岸，期以促销者利运，以多运者纾场灶，交相灌输，首尾并举，迄于清末，垂四十

① 许承尧撰，李明回等校点：《歙事闲谭》卷14《汪仲伊先生传》，黄山书社，2001年，第486—489页。

② 缪荃孙纂录：《续碑传集》卷79《户部侍郎胡君荃甫事状》，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第563页。

③ 王振忠最早对程希辕、程桓生父子的作幕经历进行论述，具体参见王振忠：《从民间文献看晚清的两淮盐政史——以歙县程桓生家族文献为中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④ 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书信之六》，岳麓书社，2011年，第27册，第359页。

⑤ 参见石国柱、楼文钊修，许承光纂：民国《歙县志》卷6《人物·宦绩》，“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246号，第999—1000页。

年，从事者惟谨，而与时弛张，相为终始，惟府君最久且独多。<sup>①</sup>

上述材料既记述了咸同兵燹时期曾国藩对两淮盐政所实施的措施，又体现了程桓生在曾国藩整顿两淮盐务中的作用，及其在幕府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程桓生的家世与官商背景，为其进入曾国藩幕府提供了契机。反之，程桓生在作幕期间两次担任两淮盐运使，促使程氏家族的盐业运销在咸同兵燹之后仍能有序运营。正如王振忠所说：“程氏家族之所以在太平军尚未覆灭之时便能在两淮盐业中先声夺人，与程希辕的家世及官商背景有关。具体说来，这主要与程希辕、程桓生父子与曾国藩的交往密切相关。”<sup>②</sup>至咸同时期，“拥有各级各类职衔的官员成为幕僚后，他们就有了双重身份：亦官亦幕或亦绅亦幕”<sup>③</sup>。出身徽商家庭的幕友则又多了一层身份，即“亦商亦幕”。

（三）幕友家庭。清人顾肇熙说道：“幕为专门名家之学。”<sup>④</sup>作幕需要专门的知识，这种有关作幕的专门知识被称为“幕学”。幕业是一种亲缘性较强的职业，幕业往往是父子相传，或者“从戚习幕”。这种家人之间、亲戚之间的幕业传承极为便利，可以随时请教或传授。在徽州幕友群体中，子承父业的现象较为普遍。歙县人吴闾，“弱冠补县学生，六试秋闱辄报罢，乃慨然弃举子业。南登会稽，游建康……与江右名流相赓和。闾为文章能洞彻秦汉以来流变得失，为诗歌古淡简远间发为雄肆……盖闾虽捐弃科名，而于学问、文章未尝须臾废，诚不忍其没世无传于后也。自闾之大父家已中落，父益贫，闾以授徒所得脩脯，尽供其父母……闾以贫，诸生，供养其一门男女，以长以立。初随父客豫章，豫章旧游最重闾”<sup>⑤</sup>。为了维持家计，吴闾在江西豫章（今南昌）作幕数十年。吴闾在豫章作幕期间经常写信督导其子吴定的生活与读书情况。<sup>⑥</sup>吴定在父亲的影响下，“敦品励学，事亲谨，三年制丧如礼，自期功及师友丧，饮食起居必变于常。少与姚鼐同受古文法于刘大櫟，尤相友善……家本贫，至老贫益甚，屡试不售。”<sup>⑦</sup>其间，吴定先后在两淮盐运使朱子颖、安徽布政使康基田、浙江巡抚阮元等幕府任职。<sup>⑧</sup>

在徽州，幕友与父亲一起作幕已成为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如婺源人汪立中、汪之谦父子均以幕业为生，“（汪之谦）幼颖异，读书目数行下，工诗古文辞，用意遣词，出人意表。吴公存义督学武林聘谦父教读，随侍幕下。不愿考试，商籍回本籍应试，入泮后，游幕苏宁，时与诸名士相唱和，诗名大噪。由增贡试用训导，历署繁昌、太湖学师，课士有方”<sup>⑨</sup>。出身于幕友家庭的徽州幕友，既能学习幕业知识，又能深谙官场规则，为其作幕、为官、教学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此外，一些徽州读书人“从戚习幕”，即与亲戚一起作幕。如婺源人俞嘉福“因客从堂兄

① 程庆馀：《先府君行述》抄本，引自王振忠《从民间文献看晚清的两淮盐政史——以歙县程桓生家族文献为中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② 王振忠《从民间文献看晚清的两淮盐政史——以歙县程桓生家族文献为中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③ 吴亚玲：《咸同时期的清朝幕府》，《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

④ 顾肇熙：《入幕须知五种·入幕须知序》，沈云龙主编，张廷襄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湾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27辑，第3页。

⑤ 安徽通志馆纂修：《安徽通志稿》卷3《吴闾传》，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186—187页。

⑥ 参见吴定：《紫石山房诗文集》卷首《保举孝廉方正吴君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42页。

⑦ 王锺翰点校：《清史列传》卷71《吴定传》，第5856页。

⑧ 参见吴定：《紫石山房诗文集》卷首《澹泉先生事实》，第245—246页。

⑨ 葛韵芬等纂修：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35《人物·文苑》，“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第27册，第662页。



幕,就杭商籍,入泮及归”<sup>①</sup>;婺源人俞植芝“成童失怙,随伯父起鹄作幕凤阳,转渡台湾,客游十九载”<sup>②</sup>。在清代幕业中,“可以普遍看到一种‘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情形,以及以同乡关系为纽带学幕授业的情形”<sup>③</sup>。一些出身幕友家庭的徽州读书人,他们借助血缘、族缘、乡谊等关系走上作幕的道路,这种作幕现象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清代复杂的社会关系。

### 三 徽州幕友的功名

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统计,存留至今的清代徽州方志有41种。<sup>④</sup>“如果加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未著录的一种乡镇志,以及有名可考的6种佚志,其清代府县志的总数有50种左右。”<sup>⑤</sup>通过梳理现存清代徽州方志中的人物传记资料,可以较为全面的考察徽州幕友的功名情况。经过全面统计,徽州方志收录了大约166篇幕友传记。现将这166名徽州幕友的功名列于下表。

清代徽州幕友功名统计表

功名	作幕期间获得各类功名的幕友人数						合计
	进士	举人	贡生	监生	诸生	功名不详	
歙县	汪宗沂 曹学诗	吴山涛 吴鸿勋 许珏	柯钺(拔贡生) 程桓生(拔贡生)	方正澍	程 銓(廩膳生) 洪 范(诸生) 汪廷栋(诸生) 黄生原(诸生) 江世璋(附生) 许长清(邑诸生) 金 鸢(补诸生)	程文毅 巴荣祖 洪 壮 汪文钊 潘如绶 黄曰瑚 鲍夔生 郑 圻 程 敦 鲍增祥 徐 衡 徐嘉干 程 义 柯 鈞 方应诏 鲍嘉年 程 邃 江 蓉 汪 斌	34
绩溪	胡宣铎	—	—	—	—	胡家升 胡光墉	3
休宁	汪由敦	戴 震	朱 昉(拔贡生)	程仁恩	洪 范	戴朝干 方 塘 黄 瑚 汪 鸿	9
黟县	—	何宗逊 胡朝贺 程鸿诏	江有声(廩贡生) 叶梦衢(增贡生) 孙式荣(附贡生)	—	汪文台(廩生)	学 祖 胡士裕 叶效璈 黄士陵	11

① 葛韵芬等纂修: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35《人物·文苑》,“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第27册,第658页。

② 葛韵芬等纂修: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41《人物·义行》,“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第27册,第53页。

③ 郭润涛:《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第127页。

④ 参见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85年。

⑤ 刘道胜:《徽州方志研究》,黄山书社,2010年,第13页。

(续表)

功名	作幕期间获得各类功名的幕友人数						合计	
	进士	举人	贡生	监生	诸生	功名不详		
祁门	——	谢登隽	廖机 (岁贡生) 吴云山 (贡生)	陈蕃 (太学生)	——	——	4	
婺源	俞君选 朱家骏	程梦元 汪焕其	王宗瑞 (岁贡生) 程云麟 (庠贡生) 吴士升 (贡生) 戴鼎铭 (附贡生) 王攀元 (增贡生) 施中绣 (附贡生) 李振熿 (附贡生) 程振元 (恩贡生) 程兆燧 (附贡生) 程培基 (增贡生) 王昌祐 (附贡生) 齐枢 (附贡生) 余显邦 (附贡生) 王邦达 (附贡生) 程震林 (恩贡生) 戴冕 (附贡生) 朱纯 (贡生) 胡凤翔 (附贡生)	汪斯醇 施用中 (国学生) 方之崧 (太学生) 江维桓 (国学生) 金维城 詹喜俊 孙本倬 (太学生) 朱廷銮	戴思孝 (郡庠生) 余光耿 (邑庠生) 江一鸿 (生员) 程鸿吉 (童生) 江峦 (邑庠生) 程标 (郡庠生) 孙洪瑞 (邑庠生) 石光敏 (庠生) 江登 (庠生) 余家鼎 (诸生) 石声 (郡庠生) 王梓材 (诸生) 余汝庄 (邑庠生) 俞颂清 (庠生) 俞霖瑞 (增广生) 俞长龄 (邑庠生) 俞嘉福 (庠生) 江城 (邑庠生) 詹逢康 (邑庠生) 詹梦甲 (邑庠生) 王锡麟 (庠生) 王荣萱 (浙籍庠生) 汪毓荪 (庠生) 江暹 (秀才) 吴秀崧 (补邑庠生) 江纘绪 (庠生) 戴振清 (庠生) 查思滉 (邑廪生) 余存诚 (郡庠生) 李林乔 (郡廪生) 孙春洋 (庠生) 汪对扬 (廪生) 戴文昌 (郡庠生) 江峦 (邑庠生)	黄奖 余焕 詹启奎 余嘉定 程赐荣 汪廷炜 朱安义 张宏远 戴廷璋 詹蕃楨 俞嘉言 胡鸿词 余逢金 黄登瀛 张道凝 潘鹤龄 黄翔龙 程子春 黄翼 戴文煌 汪大兴	程秉勋 潘纪恩 汪长叙 胡起亨 叶仕荣 汪之谦 余文训 王廷保 余述古 俞植芝 黄国器 黄炜 查光前 詹橙 吴懋履 程世莹 孙本侃 王维垣 余绵鹿 施文	105

(续表)

功名	作幕期间获得各类功名的幕友人数						合计
	进士	举人	贡生	监生	诸生	功名不详	
合计	6	10	26	11	43	70	166
百分比 (%)	3.6	6.0	15.7	6.6	25.9	42.2	100

资料来源：康熙《绩溪县志》、道光《歙县志》、民国《歙县志》、嘉庆《绩溪县志》、康熙《休宁县志》、道光《休宁县志》、嘉庆《黟县志》、同治《黟县志》、民国《黟县四志》、道光《祁门县志》、同治《祁门县志》、康熙《婺源县志》、乾隆《婺源县志》、嘉庆《婺源县志》、道光《婺源县志》、光绪《婺源县志》、民国《重修婺源县志》等方志中的人物传记

根据上表的统计，在166名徽州幕友当中，婺源有105人，约占总数的63.3%；歙县有34人，约占20.5%；黟县有11人，约占6.6%；休宁有9人，约占5.4%；祁门有4人，约占2.4%；绩溪有3人，约占1.8%。在166名徽州幕友当中，无功名或功名不详者共70人，约占总数的42.2%；获取功名者共96人，约占57.8%。具体来说，婺源获取功名者共64人，约占婺源幕友总数的61.0%；歙县获取功名者共15人，占歙县幕友总数的44.1%；黟县获取功名者共7人，约占黟县幕友总数63.6%；休宁获取功名者共5人，约占休宁幕友总数的55.6%；绩溪获取功名者1人，约占绩溪幕友总数的33.3%。与婺源等地相比，祁门的幕友情况比较特殊，上表所统计的4位幕友均为有功名者。从徽州6县各自的幕友总人数来说，婺源的幕友人数最多，歙县次之，黟县第三，休宁第四，祁门第五，绩溪第六。从徽州六县各自获取功名的幕友人数来看，婺源位列第一，歙县次之，黟县第三，休宁第四，祁门第五，绩溪第六，这与6县幕友总人数排列顺序是一致的。这两组数据反映了徽州地区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差异性。周晓光曾指出清代徽州6县文化发展的差异性，“这种差异的基本表现形态是学术文化的三级区域构造，即由歙县、婺源组成第一层级学术文化发达区域，由休宁、绩溪组成第二层级学术文化次发达区域，由祁门、黟县组成第三层级学术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区域”<sup>①</sup>。由此可知，徽州6县获取功名的幕友数量的多少大致反映了6县学术文化发展程度的高低。

清代科举制度“已形成—个层次、等级、条规、名目繁多苛严的庞大体系”<sup>②</sup>。清代科举考试的功名等级非常复杂，由低到高大致可分为3个等级，第一，诸生又称为生员或秀才，“为士子进身之始”<sup>③</sup>，也包括廪生、增生、附生等。监生即国子监的学生，其级别与诸生相同。第二，举人为诸生应乡试中式者。五贡出身与举人级别相近，五贡即恩贡生、拔贡生、副贡生、岁贡

① 周晓光：《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地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3页。

② 金净：《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1页。

③ 昆冈等修，刘启端等纂：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368《礼部·学校·学政关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20页。

生、优贡生。第三，进士为最高一级的功名。梁启超曾说：“邑聚千数百童生，拔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拔百数十人为进士。复于百数十进士，拔十数人入翰林。”<sup>①</sup>也就是说，在清代科举制度中，从乡试到会试，再到殿试，获取功名的读书人越来越少，录取率越来越小。“（清代）科举取士，举人、进士均有定额，一个庞大的读书人群体，能中举人、进士得以出仕者终究是少数幸运儿，其中绝大多数的读书人，往往止步于生员这一科名身份。”<sup>②</sup>从上表看，获取诸生与监生的徽州幕友共54人，占总数的32.7%；获取举人与贡生的徽州幕友共35人，占总数的21.2%；获取进士的徽州幕友仅6人，占总数的3.6%。显然，绝大部分徽州幕友只获得了低级或中级功名。徽州幕友的功名恰好折射出清代科举考试中举人数的分布规律。除此之外，尚有42.4%的徽州幕友功名不详，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很多徽州幕友是下层的读书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显赫，他们的功名不容易受到史家重视，从而造成史籍阙载的现象；二是一些徽州幕友事实上从未获得功名，相关的传记没有作特别说明。

## 结 论

清代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发展最为成熟的时期，读书人参加科考的热忱程度超越前朝。这一时期，徽州科举文化也比较发达，形成了“儿童也识科名重，送学红旗写状元”<sup>③</sup>的社会风气。但是，按照清朝规定，“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sup>④</sup>，“举人与进士都具有出仕为官的资格，但在实际操作中，两者所授予的官职大不一样，举人只能担任教职及杂佐之官，而进士则可以在京为部属官、在外则可为知县等官”<sup>⑤</sup>。清代的科场激烈竞争，大多数徽州读书人只能获得诸生、举人等中低级功名，取得进士功名的人只占极少数。所以，只有极少数读书人能够获得直接做官的机会。曾国藩曾说：“卫身莫大于谋食……士，劳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禄于朝，教授于乡，或为传食之客，或为入幕之宾，皆须计其所业足以得食而无愧。”<sup>⑥</sup>在曾国藩看来，“谋食”是求职者的最基本的目的，作为“劳心以求食”的读书人有四种“求食”途径，即“食禄于朝”“教授于乡”“为传食之客”“为入幕之宾”。对于一些获得中低级功名的徽州读书人来说，在无法实现“食禄于朝”愿望的情况下，入幕成为他们实现入仕理想的一种比较简便的途径。

清代官员延聘幕友拥有较大的自由度，可以根据现实的需要以及幕友的才能授予幕友职位。虽然幕友不是朝廷正式的官员，但他们可以经常出入官府，为地方官出谋划策，协助地方官处理各类行政事务，这使得他们的职业逐渐呈现出明显的准官僚特征。同时，幕友的酬劳也由幕主支付，这满足了幕友赚取束脩、维持基本生活的经济需求。除了实现入仕理想、赚取束脩的目的之外，徽州幕友在作幕期间也经常从事教育、著述立说、诗酒之会等文化活动，这是他们以读书人的身份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方式。另外，战争为徽州读书人提供了入幕的机会，他们可以借此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从而实现建功立业的理想。除了自身的才能

①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3《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华书局，1989年，第22页。

② 陈宝良：《明清幕府人事制度新探——以“幕宾”“幕友”“师爷”为例》，《史学集刊》2020年第4期。

③ 欧阳发、洪钢编：《安徽竹枝词》，“黟山竹枝词”条，黄山书社，1993年，第65页。

④ 《清史稿》卷108《选举志三》，第3150页。

⑤ 夏卫东：《清代科举制度的若干问题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46页。

⑥ 曾国藩：《曾文正公家书》卷1《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中国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37页。

以外，清代徽州幕友入幕还需要一定的社会关系，这是他们能够顺利入幕的客观条件之一。总体来说，徽州幕友大多出身于官员家庭、商人家庭、幕友家庭，他们的家庭出身往往决定着入幕所需的社会关系，家庭出身的不同使得徽州幕友的教育经历、入幕心态、作幕活动存在一定的差异。此外，徽州各县的文化发展存在不平衡性与差异性，文化发展程度的高低决定了徽州各县入幕风气的强弱。相对而言，婺源、歙县入幕风气最为兴盛，休宁、绩溪次之，祁门、黟县则最弱。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清代徽州幕友人数较多，但与名噪一时的“绍兴师爷”相比，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关联性极强的群体，徽州幕友之间血缘性、乡缘性较弱。尽管如此，考察清代徽州幕友作幕的原因、家庭出身与功名，对于我们加深对徽州读书人这一群体的认识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我们揭示了清代徽州科举文化与幕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本文责编：周全

### 毛东武《方志资料学》出版

继《方志编纂学》《方志语言学》之后，方志学者毛东武第三部方志学专著《方志资料学》，于2020年12月，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作共9章32节，阐述方志资料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学科体系、基本特征，论述涉及方志资料诸多问题，包括方志与方志资料种类、方志资料的内容、方志资料的发展历史、方志资料的要求、方志资料的搜集与考证、方志资料的整理与编排、方志资料的应用功能、方志资料学的出现和前景等。该书还设有附录，选录作者有关方志资料论述之作。

毛东武年愈八旬，从事方志工作前后40年，尽管离开地方志工作一线多年，但退而不休，笔耕不辍，除撰写上述方志理论著作，一共主编和参编过15部地方志，包括《江山市志》、《衢州市志》、《清湖镇志》、《白沙村志》（2019年版）、《六家志》、《坂头（自然）村志》等。

(毛东武)